



学问之道 知行合一

——记中央党校田嵩燕老师



□ 谢艾雯

追求“贯通”的学术旨趣

田嵩燕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专家欧阳哲生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生，早年攻读的方向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思想史是一门由“死”到“活”的学问，先要沉潜下去，从人物、文本入手，抽丝剥茧般地细致分析，而后要超拔，从零散的观点细节里梳理出脉络。出色的思想史学术研究，需要“广博”与“专精”的结合，且非有坚定的恒心毅力不可。入职中央党校后，田嵩燕老师的研究重心逐渐后移，开始致力于国史及中国当代文化问题研究。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既是对党校教学科研要求的积极回应，同时也体现了田老师关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认识：必须以长时段的视野、贯通的方法来理解和分析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问题。

田嵩燕老师一直强调，要用贯通的理念来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文化问题。她认为，要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传统文化的转型变迁，再到20世纪中叶中国文化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乃至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发展看成个连贯的过程，通过梳理100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核心问题，分析比较其中的承继流变，从而更清晰地理解中国文化发展转型的内在逻辑和成长动力。在梳理中国文化发展的长时段纵贯线的时候，也要把近代

以来思想文化的发展转型看作是一个立体多维的进程，是在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环节的复杂因素交织互动作用之下的结果，因此不能就文化问题研究文化问题，而是要努力以贯通的方法破除学科畛域，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来支撑对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这种追求“贯通”的学术旨趣要求打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边界，当然对研究者的学养功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需要研究者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不断提升自身视野的广度与深度。这样的高标准严格要求对于初学者来说，难免望而生畏，但田老师说：初学者当然要量力而行，首先从具体问题入手做细致入微的研究，在做具体研究时，心中也必须存大视野大观照。惟其如此，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才能有深度有见解，这就是“取法乎上”的真谛。

坚持这样的学术标准和志向，对一个学者来说，意味着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意志力，不追热点，不降标准，坚信蹈行。这种研究旨趣的背后蕴含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田老师关怀的是100多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难题如何破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选择，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愿景和目标如何确定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而对于这些核心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正是一个思想史研究者的学术使命所在。

教学科研“两轮驱动”

田嵩燕老师的学术旨趣和专业素养，在中央党校的主体课堂上得到了

展现。近10年来，她在中央党校主体班次开设了一系列文化、历史专题的课程，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重建”“新中国的文化发展脉络”“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发展与我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等等，这些课程的内容涵盖了从晚清到今天100多年的文化发展历程，其路径都是立足于思想文化史的专业研究，观照和解释当代中国的重大文化问题，既有学术底蕴，也有现实关怀。这些课程覆盖了从省部级、中青班、西藏班到各类厅局级班等各个主体班次，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发展与我党的文化自信”一讲获评全国党校第一届精品课。

2016年，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召开，迫切需要开发新的课程以充实党性教育课程体系的背景下，田嵩燕老师又开拓了一个新的教学领域。她带领团队通过讲题招标、集体攻关，成功打造了一堂党性教育精品课“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这堂课将思想史、政治文化的研究视角引入党性教育研究，从价值观的角度阐释和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兼顾了政治要求和学理支撑，体现了党校课堂“用学术讲政治”的要求，也获得了良好的课堂效果。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田老师没有放松自己的科研工作。在专业领域，她继续坚持窄而深的研究，出版了专著《国家主义派政治思想研究（1924—1930）》。这本专著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20世纪30年代重要政治思想派别“国家主义派”的著作。

与此同时，她努力以广博的涉猎钻研拓宽对于文化问题的研究，先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学习时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传统文化复兴、当代文化发展、党内政治文化等主题的文章，被各大主流媒体广泛转载。田老师说，她希望在这样的持续努力中，真正实现教学科研的良性互动，以教学科研“两轮驱动”的方式支撑党校的主课主业，担当起一名党校教师的责任和使命。

知行合一 事在担当

对于田嵩燕老师来说，历史学不是故纸堆里的学问，而是安身立命之所在，历史学的思维方式已经深深渗透进了她的为人处世之道中。田老师在十几年的工作生涯中，最看重的是长期的学问和能力的积淀。她也常告诫学生：坏事可能变好事，好事也可能变坏事，学会长时段地看问题，就不会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这既是一位老师的言传身教，也是一位“历史人”的方法论。

对待主体课堂教学，田老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待研究生教学，田老师教书育人，尽职尽责。在课堂上，她带领学生研读本学科最经典、最权威的著作；她注重从培养资料搜集能力、分析理解能力、思考表达能力入手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学术训练；她引导学生从当下最热点的现实问题入手，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中寻找答案。在课下，田老师会就学习的困惑、人生的规划给学生以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她从不作出绝对的判断，常鼓励学生说：“一切问题都是历史进程中的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

党校的部分教学任务有时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完成一个新讲题的准备工作，任务急而且担子重。面对这种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田老师每次都是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因为在她看来，担当是责任，任务是历练，不能讲条件，也无需畏惧。伴随着一次次的攻关备课，一次次的任务完成，田嵩燕老师对党校课堂的严肃性和神圣性有了更深的敬畏，对于党校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了更深的体会。可以说，田嵩燕老师的奉献、担当、责任、使命，尽在三尺讲台间。



不足道，但是散文随笔可以随时把治学的所思所得记录下来，尽管是千字文，但是文中力求有一点见解，有一些审美的追求，如此一得之见，一孔之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未必不成就一部专著。其次，散文随笔是一种自由的文体，经常练习随笔写作，不经意间会锻炼文笔的洗练，做到微言大义，与此同时还可以养成活泼的文风，使自己的学术写作更为鲜活有趣。当然，学者写散文随笔也有某些顾虑。一方面，高校科研单位还没有把散文随笔列入科研考核内容；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囿于传统的观念，认为散文随笔乃是“雕虫小技”，自然就“壮夫不为”了。其实，学术随笔需要有厚实的学识修养和扎实的文字功底，故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好的。这些都是制约散文随笔繁荣的因素。

整体看来，大凡学问家都是多面手，各种文体不在话下。他们的名文也许不是那些煌煌巨著，倒是一篇篇短文写得深厚迷人，足以支撑一个学者的本色，让人服气得很。做学问可以从散文随笔做起，期待为做学问而写的散文随笔构成学界一道学术景观。

自己的诸论点 and 它们的有力根据。论据的力量在于资料可靠充分，推理周密，符合严格逻辑的要求。这在自然科学中更加重视。但是写成这样的论文往往一下子做不到，我觉得可以先写成随笔发表。你可以从早发表得到很大好处。”这真是经验之谈。

其实，学者写散文随笔，古已有之。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很随意的文学样式。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唐宋八大家，到明代的公安三袁、李贽等，可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学者散文；五四新文学以来，从鲁迅、胡适、周作人、林语堂再到后来的钱钟书、梁实秋、金克木、张中行等学人，都是散文随笔的名家。今天，放眼报纸副刊，仍然活跃着一大批学人散文写家，比如周国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学者的作品。他们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兴之所至，任心闲话”，往往寥寥几笔，即入木三分，妙趣横生，令人扼腕赞叹。

在笔者看来，学者写散文随笔，好处多多。首先，它是治学的副产品。比起鸿篇巨制，散文随笔可能微

在纪念冯其庸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一些媒体刊发了冯其庸先生的散文自选集《人生散叶》一书的自序。“冯其庸先生也写散文？”——编辑使用了这样的标题。通常在人们的眼里，写散文是作家的事，做学问的写了散文随笔，不免让人有些惊讶。殊不知，散文与学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写散文的既可以是作家，亦可以是学者，只不过学者的散文富有才学而作家的散文则更具才情吧。

毫无疑问，散文也应该是冯先生治学的一部分。正如他在序言里所说：“为了校订和研究《红楼梦》，我重视做历史调查。所以我的不少散文，实际上都是调查的结果。”与先生持同样治学观点的还有于光远先生。于公早年致力于经济学领域多有建树，后来专攻随笔杂文，成就卓著。为什么要写这些小的东西？他在治学的心得中说：“科学研究成果通常以议论的形式发表。在长期科学研究的实践中，论文已形成某种格式，要求确切地表述研究后作出的结论，写清楚

为做学问而写的散文

□ 孙建清



核心阅读

从根本上说，思想或思潮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存在，且思想总是处于变化或变动中，研究思想史必须用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辩证的眼光考察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研究思想史，其基本方法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一言以蔽之，必须实事求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学术评论

中国近代思想史时间跨度长，空间延展广，内容丰富驳杂，其研究方法亦随着时代和学科自身的演进与时俱进。大致而言，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影响较大的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文本解读法。思想家的思想是时代思潮的集中体现，往往集中反映了某一特定时代的核心思想，思想家的思想是思想史研究的重点。思想家思想的主要载体是思想家留下的论文、著作、随笔、个人日记、亲友书信等多种形式的文本，故文本解读法是传统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文本解读法主要是结合时代背景、思想来源，探究思想家思想产生的缘由、提出的观点及其发生的影响等。文本解读法不能就文本论文本，就思想论思想，也不能过度阐释，随意发挥。在解读文本时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细致梳理某一思想或思潮赖以产生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考察思想家与时代、思想的产生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思想家的思想与现实历史进程有机结合。

心理分析法。思想或思潮作为社会意识，其产生除了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产或社会存在之外，思想家个人的心理、性格、气质、情感等因素也起着一定作用。因此，研究思想家的思想，必须研究思想家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对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还必须注意思想家当时的社会地位、社会认同态度与心理状况。思想家个人阅历中的独特经历，如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青少年时期的重大挫折，都有可能影响到其思想的表达方式与价值取向。因此，思想史研究必须重视心理分析方法。如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法、马斯洛提出的人类动机理论等，都值得重视和借鉴。实践证明，通过心理分析法研究思想家的心理活动和个性特征对其思想的影响，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思想史的研究。

思想史与社会史会通的多学科研究方法。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研究视线下移，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从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去考察近代思想的发展历程。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大量使用，拓展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史料和论域，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使思想史从以往偏重于政治思想、精英文化和哲学观念，逐步转向探究社会当中的大众生活、社会文化与集体心态，转向借助知识文本、节庆仪式、公共空间以及宗教（包括迷信）、医疗、身体、性别、物质文化等途径，探究思想史的多元复杂面相。与此同时，人类学、语言学、文化学、统计学、后现代主义等学科的方法也被大量引用到思想史的研究之中。可以预见，多学科会通、跨学科交融将成为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趋势。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 冯夏根

观念史、概念史与话语分析方法。近年来，观念史、概念史与话语分析方法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运用日益广泛，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其中，概念史研究更是异军突起。概念史研究最重要的主旨和功能，是追溯概念内涵的起源和演变，揭示概念如何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并将概念含义的变迁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和实践行动联系起来考察，从而突破了历史语义学的范围。由此，革命、知识分子、中华民族、科学、公理、社会主义等大量常见又耳熟能详的概念成为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概念史研究有助于开拓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和推动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其成果值得期待。

法无定法。思想史研究还要借助实证研究法、阶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代际研究法等一切可以借鉴的方法。但从根本上说，思想或思潮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存在，且思想总是处于变化或变动中，研究思想史必须用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辩证的眼光考察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基本方法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一言以蔽之，必须实事求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正如思想史专家耿志所言，研究任何学问最基本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事求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亦是如此。